

当代学术思想文库 - 高宣扬作品

La pensé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depuis 50 ans

# 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

从近代文明产生起，法国思想就以其深刻的哲学基础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独居特殊地位，而通观近五十年来当代法国思想的发展历程，同样可以发现，它依然构建着当代整个世界文明及其理论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



高宣扬 著

上

当代学术思想文库 - 高宣扬作品

La pensé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depuis 50 ans

# 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

高宣扬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高宣扬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当代学术思想文库·高宣扬作品)  
ISBN 7-300-06808-1

I. 当…  
II. 高…  
III. 思想史—法国—现代  
IV. B5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0491 号

本书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大陆地区出版发行简体字版本。



当代学术思想文库·高宣扬作品  
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  
高宣扬 著

---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社 址  |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 邮政编码 100080            |
| 电 话  | 发行热线:010-82503022<br>编辑热线:010-82503013                                                                                                                                                                                   |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longlongbook.com">http://www.longlongbook.com</a> (朗朗书房网)<br><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人大出版社网)<br><a href="http://www.ttnet.com">http://www.ttnet.com</a> (人大教研网)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印 刷  | 保定市印刷厂                                                                                                                                                                                                                   |                        |
| 开 本  | 705 × 1000 毫米 1/16                                                                                                                                                                                                       |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
| 印 张  | 49.75 插页 2                                                                                                                                                                                                               |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字 数  | 778 000                                                                                                                                                                                                                  | 定 价 69.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代自序：在哲学与非哲学中迂回

我的哲学生涯，就是我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生活使我喜欢哲学，哲学使我懂得了生活；浪迹天涯的生活历练以及惊涛骇浪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又加深了我对哲学的理解，并时时推进我的思想情感，穿越人文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通过在各种文本中的循环迂回反思，试图探索生命的奥秘。从十五岁到今天，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在国内外颠沛流离的游牧生活命运，我始终同哲学打交道，并在同哲学的交往中，不断地改变对哲学的看法，而我的命运本身，也渗透着哲学的神秘力量，使我品尝了生命过程的酸甜苦辣滋味。哲学作为生存的一种实践智慧，以其对生命本身的关照和澄明，见证了它无愧是生命的灵魂。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哲学无非是一种无止境的感恩和怀念。当尼采在晚年穿透历史而发出“重估一切价值”的豪迈口号时，他仍然以感恩的心情，由衷地称叔本华为他的最早的“教育者”(als Erzieher)(参见尼采 *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 1873 - 76)，从而一览无遗地展现出尼采的“永恒回归”的广阔理论视野。

在我的哲学生涯中，时时伴随我思想脉动的内在力量，来自我生命历程中的各种遭遇。而在我所遭遇的关键人物当中，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的，就是五个人：我的母亲、毛泽东、马克思、康德和尼采。他们分别地出现在我生命转折的不同时期，使我在亲身经历的不同的生活时空中，从出生入死、苦乐交替的动荡不定生活和深沉反思中，懂得了哲学与生存之间的血肉交融关系，体会到哲学的开放性及其在人生历程、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中进行流连忘返的极端重要性。

1939年初，在阴历虎年岁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隆隆声中，我出生

在一个漂泊海外多年的华侨教师家庭。我的父母靠他们所获得的暨南大学和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文凭,四十多年如一日,始终任教于华侨教育界。他们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永远都以任教的学校为家。如同萨特从小就在其外祖父的带领下看书一样,我也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在身为华侨学校教师的父母的教导下,培养出以看书写字为乐的生活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父母不但给了我肉体生命,尤其还赋予我精神生命和哲学灵魂。

打从童年时代起,每当夜幕降临,我就偎依在母亲身边,陪同她批改学生作业,殷切期盼她在夜深人静、改完学生作业之后,字字句句带我习读动人的神话。妈妈耐心地指导我看书,并在阅读中,启发我敞开想象的大门,训练我最初的超越现实的能力,还教我学会查《王云五四角号码字典》和看地图。爸爸则几乎天天在晚饭后的散步中,向我讲述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并严厉地要求我熟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试图让我从人类经验中,体验人生的艺术。从此,查字典和看地图,成为童年时代最吸引我的游戏活动;学校图书馆和挂在教室墙上的各种大地图,也成为我的玩伴和游戏场所。每当我在字典里亲自发现一个新词汇,认出一个新国家、河流、山脉或港口,就喜出望外地向妈妈报告,于是,妈妈就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由此,我慢慢地懂得了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生活道理:以寻求智慧的好奇,扩大自己的人生视野,是真正回报母爱的最好途径,也是享尽令人陶醉的人生飨宴的珍贵机遇。

七岁那年,妈妈教我从头到尾系统地看书的最初读本,是当时学校图书馆藏的《苦儿努力记》和《岳传》。前一本是法国作家马洛(Hector Malot)所写的“Sans famille”(原文直译为“无家可归”)的中文译本,为中国作家夏丏尊所译;后一本是属于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历史普及丛书。这两本书所散发出来的精神魔力,对我的思想和生命成长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它们不仅一直伴随着我的心灵成长过程,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可以说,它们不折不扣地成为我一生命运的镜子和缩影:我本人所经受的大跨度时空变迁,大起大落,以及一切令人刻骨铭心的生活煎熬和情感震荡,都活生生地重演了两本书的情节。

当我第一次阅读《苦儿努力记》时,首先使我佩服的,是译者夏丏尊先生:他竟把原来法文的著作流畅地译成中文!我当时就暗自立志,长大后要像他那样,成为懂得多国语言的作家。事隔三十一年之后,1978年,我移居法国巴黎,竟然在巴黎地铁网上,找到了《苦儿努力记》所提到过的巴黎东南郊城镇 Boissy - Saint Léger。我兴奋地多次访问这座城镇,东张西望试图发现小说主人

公雷米(Rémy)随同抚养他的民间杂艺表演老艺人的历史踪迹。以后,我又特地两次到《苦儿努力记》所讲述的法国东南弗朗斯孔泰(Franche-Comté)地区度假,来往于瑞士和法国边界,抱着缅怀、同情和鉴赏的态度,反复沉思流浪儿雷米当时徒步穿越这一地区山川大地的哲学意义,因为我已经从我个人亲身经历的哲学炼狱与人生沧桑沉浮的过程中,体会到我同雷米一样,不由自主地在不同舞台上,演出了类似的充满戏剧性的游牧生活遭遇。同样地,《岳传》给予我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一直成为我的不可磨灭的情结之一,每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不管我身在海外何处,也不管我在地球的哪个角落,这一情结如同有一股神秘不可测的力量,影响着我的思路和情绪的起伏;而岳飞晚年遭受陷害的悲剧,也在“文化大革命”对我的“隔离审查”和一再地“批斗”中,活灵活现地重演着:人们当时竟然对我的华侨爱国之心,抱着怀疑、鄙视,甚至嘲弄否弃的态度!

这一切,就是我的哲学思想的基础和起点。随后,即使哲学把我带到古希腊、古罗马或古典时期的德国以及当代法国,都脱离不开少年时期母爱和母文化对我的熏陶;同样也无法抚平被残酷无情的现实生活所刻烙留下的沉痛创伤,它们时时申飭着我的心,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并以顽强的精神,渗透到我所吸收的一切文化当中;反过来,我的喜怒哀乐情感越是起伏不平,面临的新鲜文化越是层出不穷,我对生活和哲学的“流浪”、“迂回”、“永恒轮回”的性质,就感受得越深。

1952年,十三岁,是《岳传》所传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我决定离开在印尼的温暖家庭,只身归国求学,并选择享有“老革命根据地”荣誉的东北,作为我在祖国的落脚点。从热带零上二十多度的印尼到北温带寒冬零下二十度,从天天吃大米到顿顿吃高粱和窝窝头,不但没有使我对自己的选择有所悔恨,反而更加深了参与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决心。

正是在东北,我在母文化的基础上,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同时又大量地阅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和外国文学作品,使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的少年青春期,被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所充实。在此基础上,十五岁那年,高中一年级,第一次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成为我的处女哲学读物。

毛泽东教给了我第一个哲学概念: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理

论总结。这个哲学定义长久地指导我的人生观和哲学立场,促使我在十八岁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把研究哲学当成我的终身第一志愿。为此,我要永远感恩和怀念毛泽东。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和康德先后激发和加深了我对哲学的理解。确切地说,在大学和研究生时期,我首先是以毛泽东的哲学定义解读马克思和康德。接着,马克思的哲学让我进一步学会将人的激情与哲学的反思结合起来,使辩证法的精神与生活的逻辑扭结合一,以大无畏的探索实践,寻求自然、社会和生活的真理。到了研究生阶段,在我的导师郑昕教授的亲自指导下,我用了三年半的时间,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及《判断力批判》三大著作,给了我关于人的认识、道德和审美三大基本能力的教育,让我领悟到“人作为目的自身”的最高尊严;同时也明白了人的理性及其界限,启发我要善于在生活中,依据具体情况,独立自主但又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理性。

1966年春天,我手持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文凭,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到工作,但迎接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这时,也只有这时,我对毛泽东、马克思和康德的哲学理解,才真正地受到了检验,我也受到了终身难忘的哲学教育。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指出: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个人的和亿万人的历史实践,像火焰翻滚的熔炉,熔化掉一切虚幻的理念和天真的情怀。我的个人命运同无情的权力争斗、亿万人的生离死别铰链在一起。这是我一生中最悲惨,但又最丰富、最珍贵、独一无二的经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虽然身在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地的北大哲学系,但我始终得不到机会认真系统地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文化大革命”对我长达八年的“隔离审查”,在门窗紧闭、暗无天日的戒备森严的环境中,我反倒获得了机会,让我反复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大卷及《资本论》三大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反复穿越毛泽东和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思想、语言论述、历史、生活逻辑、生命情感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神秘交错结构;同时,人类社会也以最典型的形态,暴露出它的正反两面性;历史的悲剧与喜剧,特别是迄今为止人们试图千方百计加以掩盖的那些最丑陋、最肮脏、最虚伪的正式情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都赤裸裸地同时生动地上演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历史浩劫,又是人性

和兽性联合同场演出的历史狂欢节。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获得的生存实践智慧,比我在任何时候所累积的经验都更深地扎根于灵魂的核心中,时时牵动着我的哲学思路。后来,即使到巴黎或台北,“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经常从无意识的底层冒现出来,影响着我对世界和哲学的看法。

从1978年离开中国大陆以来,我先后在香港、法国和台湾居住,也多次横渡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足迹遍布欧、亚、美。同我的生活经历一样,我的哲学研究领域,涉及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其实,我的学术领域的转移,同以往亲身经历的生活历程一样,一方面并非单向性和一次性的,而是循环的和重复的;另一方面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它是由三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是我的哲学研究本身,由于我对哲学持有开放的态度,促使我不由自主地从一个领域走到另一个领域;其次,思考本身的无形力量,特别是其中来自生命活动本身的非理性的情感和意志力量,超出我的主体意识,推动我不断越出学科的界限,不仅在不同哲学派别的文本中间穿梭,也深入到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理论等方面,试图在多向和多维的时空中,寻求新的自由可能性;第三,当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和不断转向过程,也引导我不断突破原有的范围。

在法国的二十五年,当代法国哲学家不断逾越传统哲学的边界,并与多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进行无拘无束的对话式的创新过程,使我心花怒放,带领我跨入无限自由的哲学新天地。

从1978年起,历经颠沛漂泊而进入“不惑之年”的我,终于领会到尼采为什么要以“超人”(der Übermensch)的激情,宣告人的生存的“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的本质。“文化大革命”所刻印的伤痕,早已见证了尼采的论断。其实,要真正实现康德所说的“作为目的自身”的人的最高尊严,不是单靠理性和仁慈善心,而是还要凭借超人的权力意志及灵活机动的生存艺术策略,以鉴赏人生艺术的豪迈态度,敢于面对和逾越一切障碍和界限,大无畏地迎接人生的暴风骤雨,向一切“不可能”挑战,时时超越实际生活的范围,开辟新的生命境界。不能只是从“权力”和“意志”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尼采的哲学。权力意志是一种永不满足、永远自我更新、自我充实、自我扩大的逾越欲望,是彻底摆脱自然状态的、真正的人的永不枯竭的生活动力,又是具有最高尊严的人,历练人生的纵横驰骋,泰然自若地出生入死,精通生死艺术,确信自己将“同这



太阳、同这地球、同这雄鹰、同这条蛇一样”，“永恒地回归到同一个自身的生命”的崇高情操。人是在不断创造中实现自由超越的特殊生命体。哲学家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真正地将自身的思想同生活情感、同人类历史、同他人的各种文本连成一片。

实际上，没有一种真正的哲学思维是可以脱离实际的生命情感的。思维并不是只发生在某个孤立的主体意识之中；没有生活激情的思想是死板的，不同他人的文本进行来回交往的思索是贫乏的。在真正的哲学思考中，如同生活本身，理性、意识、情感、意志、欲望以及无意识等复杂因素，甚至包含一些无法说出、难于确定、不可预测的神秘力量，永远都混合在一起，而且也紧密地同思考者本身的生命律动及其生活世界相交错。哲学只有在同非哲学的比较、交往和对话中才能存在。哲学所追求的思想自由，使它本身永无止境地进行自我超越和超越一切。

然而，超越本身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超越”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永不平静，更不归结为胡作非为。超越过程，包含了生活中必要的平静和节制，集中了生活和思维的艺术性。在我最近研究的福柯的生存美学中，我再次感受到超越过程的审美意义。

在出国流浪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通过穿越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的文本的迂回，在陆续总结生活经验和哲学思考心得的过程中，撰写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实用主义和语用论》、《罗素哲学概论》、《弗洛伊德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论》、《解释学简论》、《德国哲学的发展》、《罗素传》、《毕加索传》、《萨特传》、《利科的反思诠释学》、《布尔迪厄》、《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流行文化社会学》、《当代社会理论》、《论后现代艺术的不确定性》、《后现代论》、《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当代法国哲学导论》及《福柯的生存美学》等二十五本专著。由五百万字所交织而成的文本，并不全是我本人所要说出的话语，因为生活和哲学思考所经受的体验和其中的情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如实地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重要的是它们毕竟以折射镜的方式，表现了我的生命律动和情感。但是，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书同我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具有本质意义的，在于它们是“他人”的文本的交响乐似的回音，隐含着现实与历史、过去与未来、生与死、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永恒回归历程的和声。它们还不仅仅在形式上，更在内容方面，体现了生活和哲学生涯的流浪特质。

今后，只要我一息尚存，我绝不会放下笔，要不停顿地继续在广阔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文本间进行游泳穿梭。哲学没有界限，也不应该有终点；它同生命之间的永恒回归，正是哲学本身无可逃脱的命运及其生命力的源泉。

高宣扬谨识

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 自序

为庆祝 2004 年中法文化交流年的到来，我将原来曾经在台北由五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重新做了增订和扩充，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简体字出版。

人类历史自从进入 21 世纪以来，社会的发展步伐令人惊异地加快。法国思想界在这短短的几年内，也同样经历了新的变化。因此，趁着这次简体字版出版的新机会，我重新补充了新的内容和资料，使本书更能切合当代法国思想界的新变化状况。

这本书从资料准备到撰写的过程，整整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我本人自 1979 年移居法国巴黎以来，经过长期耳濡目染的过程，当代法国思想和整个法兰西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熏染着我的心灵，成为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 年到台湾东吴大学任教后，我所讲授的课程，绝大部分都是围绕当代法国思想和西方文化。同时，我一直继续保持同当代法国思想家的联络和交往。每年寒暑假及休假期间，我几乎都在充满文化气息的法国土地上度过：我一方面时时访问当代著名的法国思想家，向他们请教，同他们探讨与对话；另一方面，又在法国学术界和文化媒体中，广泛收集和整理各种有关当代法国思想动态的最新研究资料。这样一来，在法国二十多年的生活和研究，以及在台湾教学期间对于法国思想的不停顿的探索过程，把我的精神生命带领到一个新的广阔境界。如果说，童年时代在印度尼西亚生活和学习期间所形成的早期心灵结构，已同青年时代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所受到的教育及“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改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前半生精神生命的重要思想基础的话，那么，70 年代末以来，在法国的学习、研究和生活过程，就为我原有的思想基础加入了新的更

为可贵的成分，以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的精神生命获得了“重生”，进入康德所说的“成熟”阶段，从而开始具备进行自由地独立思考的能力。

康德早在1784年写给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ohn, 1729—1786）的信中曾说：“所谓‘启蒙’（Aufklärung; Lumières），就是人从其自身所造成的不成熟性中解脱出来；不成熟性指的是，在没有别人引导的情况下，不能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智。这种不成熟性是自身造成的，因为它并不是由于自己缺乏理智，而是由于没有决心和勇气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独立地使用自己的理智”（Kant, I. 1784）。康德特别强调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智进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把它当成是否完成启蒙并达到成熟阶段的基本标志。虽然康德的这段话，我早在50年代末，在北大学习时就已经熟读过不止一次，但只有来到法国以后，才真正体会到它的深刻意义。

思想自由对于人来说是何等重要，只有在反复经历生活磨炼和沉思之后，才能有所领悟。但领悟是一件事，真正将它转变成自己的精神生命的基本原则，又是另一回事。敢于在任何情况下实现个人思想自由，谈何容易。正因为这样，我才说，即使到法国后，我仍然只能说，自己至多也不过“开始具备进行自由地独立思考的能力”。敢于自由地进行独立思考，对我来说，还仅仅是开始。我个人的思想成长经历，一再地感受到达成“思想成熟”的艰难和曲折。我是在“不惑之年”到达法国的。最近二十多年，表面看来，我的生命已经跨越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和“从心所欲”的门坎，并正一步步地迈向“不逾矩”的“古稀之年”。但个人思想和精神生命实际上仍未完全成熟；在许多重大事件和问题面前，往往“惑”然踌躇，无所适从，难于或没有勇气作出正确抉择。

然而，在法国二十多年来的生活，毕竟使我幸运地亲身经历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最深刻的理论典范转换的阶段，生活于人类历史和文化发生急剧变化的世纪转折的关键时刻。这是西方“现代性”（modernité）文化经历近四百年成长、发展和反复危机的过程之后，终于达到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和全面自我批判的时代，因而也是“现代性”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连续不断进行的自由学术争论所带来的理论建设和文化重构的活跃繁荣局面。精神分析学（psychanalyse）、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néo-marxisme）、符号论（sémiologie; sémiotique）、诠释学（herméneutique）、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e）、解构主义

(déconstructionisme; déconstructivisme)、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e)、新女性主义 (néo-féminisme) 和后现代主义, 各种理论派别、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 先后登场, 各抒己见, 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创造局面。拙著《后现代论》序言中已经说过,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 (Jean - 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 就是在我刚到巴黎时发表了他的《后现代的条件》。1980年, 伟大的思想家萨特和罗兰·巴特先后去世的事件, 曾经给我很大的心灵震荡, 激励着我以更加狂热的情感, 潜心阅读他们的著作, 并认真思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先后逝世, 使我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性、生命的短促和脆弱性, 也使我更加珍惜生活的一分一秒, 以最大的效率投入研究。从1980年到1983年, 当我在巴黎大学准备和撰写博士论文《论霍克海默的唯物论》时, 在北大时期所形成的原有的马克思思想观点, 开始同在法国时期所感染的各种新思想相互交错和进行对话, 构成了我本人思想转变中最紧张和最有意义的新阶段。当时, 我获得机会, 先后在法兰西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巴黎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des Sciences Humaines et des Sciences Sociales)、巴黎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École Nationa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 等著名高等学府, 直接聆听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1925—1995)、列维-斯特劳 (Claude Lévi - Strauss, 1908— )、里克尔 (Paul Ricoeur, 1913— )、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 1905—1995)、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1930— )、维尔南 (Jean - Pierre Vernant, 1914— )、迪梅齐 (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 及塞尔 (Michel Serres, 1930— ) 等人的讲演、课程和研讨会, 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当代法国各重要思想家会面, 同他们直接对话, 讨论共同感兴趣的理论问题。从1983年到1988年, 我得到巴黎第十大学副校长拉毕卡 (Georges Labica, 1930— ) 教授同意, 参与他所领导的科学研究小组, 并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所属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同时, 我也很幸运, 能在我的指导教授维德琳 (Hélène Védrine) 和奥里维耶·勒沃·达伦 (Olivier Revault D' Allonnes, 1923— ) 的推荐下, 在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法国哲学学会主席雅克·董特 (Jacques D' Hondt, 1920— ) 和拉毕卡的帮助下, 在当时由密特朗总统直接推动下成立的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中, 连续两年主持关于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研讨会。当时任国际哲学研究院院长的德里

达，还数次接见我，鼓励我探讨中国文字与西方文字的差异性及其对文化传统模式的影响。他说他很关心语言、文字、言说、思想与整个文化结构的关系，对于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的中国文字深感兴趣。当我受台湾“国科会”邀请成为东吴大学教授之后，拉毕卡教授仍然让我继续兼任研究员的工作，不断地在他所主持的研究刊物上发表论文。1990年，当我讲授和研究西方社会思想史并思考其中的艰难问题时，法兰西学院的维尔南教授刚刚发表他的著作《古希腊时期有关个人、死亡、自身与他人的问题》（Vernant, 1989）。他把个人的人格和身份的自我认识和社会确认的复杂问题，同人对于“不朽”的无止境探寻的思维活动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只有人，才存在“人格”和“身份”的问题，才把这些问题同认识自身、认识生活、认识历史、认识社会和认识世界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同自己的生存及死亡、同自己的社会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深刻思想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以及米尔西亚·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的思想观点结合在一起，给了我重重一击，粉碎了我原有的世界观框架，使我惊讶地、猛烈地重新发现人的原本面貌，也对自己的生命重新进行了反思。

我深深感到，人只有在同社会和文化的反复对话中，才能最终认识自己，才能真正认识世界。从根本上说，人在一生中，不管是谁，只要他确实期望生命变得有意义，就要不断超越和逾越现实，并又不断回到现实世界；在“虚无”与有形世界之间循环游走。人的生活世界和文化实践，就成为反复超越的中介。正是在这里，我才真正理解生命和死亡的同一意义；而且，也领悟到唯有通过死亡才能表现生命。人只有在理解了生命与死亡的同样意义之后，才对自己的生活命运有所了解，才能够使自己的生活从有形的世界中扩展到无形的世界，并将两者连接在一起，在两者之间进行反复的穿越和往返，不断反思生命的意义。我不是教徒。在北大读书和研究多年，使我不想加入任何宗教组织。但到了法国以后，通过对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和各种论战的参与，更深入地理解了宗教同人的本质的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就如同人的本质同哲学、科学认识以及同艺术的必然联系一样，是哲学家和所有的人理解人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命运的基础。宗教经常被人误解为迷信权威（autorité），崇拜偶像的愚人宝物。但真正的宗教却引导人不只是关心个人生死祸福，更注重教导要关怀“他人”，像佛家那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像耶稣（Jésus）那样，为全人类的命运，宁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

使人类获得永恒的幸福，牺牲个人生命在所不惜。我在法国看到各种类型的天主教徒，他们多数有思想，又有高尚的情操，对人的生与死、个人与世界、有形与无形，都有深刻的沉思和反思。

我非常感谢法国的当代思想家们以及许多无名的普通法国人对我的思想教育和心灵熏陶。正是他们给了我新的生命，使我走出个人的生命圈，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命圈的范围，同整个人类文化的生命体融合在一起。

20世纪70年代，对于法国思想界来说，已经完成了从单纯接受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Hegel, Husserl, Heidegger，法国人简称为“3H”）和“三位怀疑大师”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Marx, Nietzsche, Freud, *trois Maîtres de soupçon*，法国人简称为“3M”）思想影响的时代，转向具有独创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时代；也就是完成了从对黑格尔辩证法、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推崇，从对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怀疑精神的追求，转向以自身思想创造为基础的自成思想体系的成熟阶段。从这个时候起，直到世纪交接时刻，历经三十多年的争论和创造，在法国思想激烈变动的洪流中，不仅可以看到法国社会生活图景以及各种物质的、有形的社会宏观架构的变革结果，而且，连同那些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禀性、喜好和品味以及在无声无息中影响到行为举止的各种心态和思想风格的变革，也表露无遗。越是深入细腻地探索其中的奥秘，就越感受到支持着这一切变化的深刻理论基础所隐藏的强大思想力量。在法国人那种浪漫自在的生活情调背后，往往包含着深刻的自由反思活动，以至于当人们无意中触犯他们的普通日常生活方式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捍卫其个人选择的自由，使他们原本闲逸多姿的情趣，刹那间变成情绪高昂的基本人权辩护士。就在巴黎乱哄哄的地铁车厢中，可以随时看到处于混乱却又高度自律的读书人，置嘈杂的车轮声和说话声于不顾，而坦然自若地翻书阅报。只有细细考察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消化他们的历史传统中隐含的思想，才能逐渐发现法国近五十年一切变化的思想根源。

法国当代思想的演变及其创造性，往往是伴随着整个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伴随着社会思潮及生活时尚的变动，伴随着广大人民群众思想风格及思维模式的转变。法国思想界及其精神创造活动同整个社会思潮的紧密关系，是法国思想和文化长期发展及普及化的结果，也是法国人思想风格独特性及其热爱思想自由的产物。布朗索（Maurice Blanchot, 1907— ）曾对法国

老百姓中所表达的“公众意见”(l'opinion publique)的性质,发表过深刻的分析和评论。他认为,在所谓“公众意见”与“传言”(la rumeur)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公众意见是传播于各种报刊中的看法和说辞,但它们从来都不会被准确地登载于特定的书报中;而传言实际上是经人们消化、吸收、理解,并产生一定看法的某些判断(Blanchot, M. 1969: 26)。所以,流传于特定时期的思想和思潮,虽然一方面同探讨这些思想观点的作品的出版和流传有一定的关系,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们,特别是思想界的敏锐分子,早已有所察觉,成为先知先觉,他们往往早在这些思想被广泛讨论之前,就已经有深刻的见解和洞见,使他们更自觉地集中钻研他们的作品,并通过他们的研究和讨论,散播于更大的范围内,从而经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思想就成为社会思潮。例如,梅洛-庞蒂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一段时间,人们和思想界对胡塞尔现象学之所以产生浓厚兴趣,并不是因为胡塞尔现象学作品的法文版的发表,而是因为当时的思想界和法国相当数量的人,已经从自己的现实社会生活的经验中,深深感受到现象学思想和方法的重要意义。他说:“正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发现了现象学的统一性及其真正意义。”(Merleau-Ponty, M. 1945: 11)。因此,问题不在于研究或确定法国特定时代的思想论题是否同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思、尼采或弗洛伊德的原著精神相符合,而是在于研究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而不是在别的时期,人们对这些思想感兴趣;探讨当时法国思想界和社会大众是在什么样社会文化条件下集中研究和争论它们的。

法国当代思想的活跃及其独创性,还深深地扎根于法国普通教育活动和社会文化传统之中。我在法国期间,经常为法国高中(Lycée)哲学教育的深刻性和灵活性所感动。法国高中哲学教育的深度,为大学、研究所以及思想界理解和创造新的哲学观点和理论奠定了基础。当代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如萨特、阿兰(Alain, Emile Auguste Chartier, 1868—1951)、德勒兹、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等人,都曾经当过中学哲学教师。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的中学教师,不管是文科的还是数理化科学的,都有深厚的哲学基础。他们在中学授课时,经常从哲学基础出发,具体分析和讨论各学科的专业问题。法国青年人高中毕业时,为了获得高中毕业文凭(Baccalauréat),必须首先通过非常严格的全国性的哲学论文(la dissertation philosophique)国家考试。最近几年,连续多次在巴黎咖啡店举行哲学讨论会



(Café philo)，最著名的哲学家都积极参加，与普通咖啡店的市民顾客们面对面地讨论哲学问题。因此，从中学生、大学生到普通市民，对哲学问题都发生兴趣；而那些最普及的报纸杂志也毫无例外地时常讨论哲学论题，把哲学同最生动的日常生活事务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形成了法国当代思想取得伟大成就的广泛社会基础。

这本书试图简单地总结半个世纪中法国思想发展的基本状况，同时也从理论上总结个人二十多年来旅居法国时期，在生活、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对法国当代思想的理解程度。但由于受到个人思想和生活环境的限制，各种缺点和瑕疵在所难免。我热诚地希望它的出版能够引起读者热烈的反应。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多次与法国思想家进行过讨论，其中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布迪厄、里克尔（Paul Ricoeur，1913—）、拉毕卡和雅克·董特等教授。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前任法国哲学学会主席、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雅克·董特对我一贯的支持和鼓励。每当我遇到各种难题时，他都会以知无不言、诲而不倦的态度，向我提供数据线索，并同我一起分析。当他知道这部历经二十多年的准备、沉思和反复推敲的书稿即将问世出版时，欣然执笔写序。这是对我的最大的鼓励，也是本书读者的荣幸。

高宣扬

2004年春修订于巴黎东郊

Marne La Vallée 寒舍

简体字修订稿

于2004年11月15日

上海同济大学

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